

# 中国农村招赘式婚姻决定因素的比较研究

李树茁 马可斯·W·费尔德曼(Marcus W. Feldman) 李 南

**【提要】** 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嫁娶和招赘两种婚姻形式。由于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和人口因素的影响,在农村中嫁娶式婚姻占绝对主导地位,而招赘式婚姻则非常少见。本文利用陕西省略阳县和三原县的调查数据,对于应时性和制度性两种类型的招赘式婚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

**【作者】** 李树茁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副教授;马可斯·W·费尔德曼(Marcus W. Feldman)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教授;李南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教授。

## 1. 背景

在中国农村,根据夫妻结婚后的居住地点可以将婚姻形式分成以下两大类:嫁娶式婚姻,即女子结婚后离开娘家到丈夫父母的大家庭居住;招赘式婚姻,即男子结婚后离开自家到妻子父母的大家庭居住。婚后居住地点的决策本身主要依赖于两大方面的考虑:家庭制度和婚姻风俗等文化因素、经济因素。由于中国农村历史上一直严格维持着父系家族制度,而嫁娶式婚姻既是保证父系家族完整性和延续的重要手段,又是父系家族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嫁娶式婚姻在中国农村占绝对主导地位,而招赘式婚姻则非常少见。Lavelly 和 Ren (1992)利用国家统计局 1985~1987 年深入生育力抽样调查数据,发现河北、陕西、山东和广东四省在 1955~1985 年间结婚的夫妻中,采取嫁娶婚姻形式的占 79%~88%,而采取招赘婚姻形式的只占 2%~4%,另有 10%~19%采取了其他婚姻形式。

招赘式婚姻在中国农村非常少见的主要原因是这种婚姻形式只是中国父系家族制度的一种应时性(contingent)变化,主要发生在没有男孩的家庭。历史上,在中国农村大多数没有男孩的家庭,领养一个男孩,特别是从本家族内领养,是最理想的选择(Wolf, 1989)。但对那些有女无子、由于各种原因而不愿(不能)领养儿子的夫妻,为了保证家族的连续性,往往招进一个上门女婿。上门女婿的姓氏或者改变成这个家族的姓氏,就象一个领养的兒子;或者上门女婿的子女之一使用这个家族的姓氏来确保家族的连续性。这里招赘婚姻主要具有保存性的功能(Pasternak, 1985)。然而在一般情况下,招赘婚姻在父系家族制度为主导的农村社区受到歧视,需要付出很高的心理成本,加上在高生育率下没有男孩家庭的比例非常低,在中国农村很少发现在大范围内流行招赘式婚姻。

招赘式婚姻在中国农村虽不普遍,但在某些地区的特定时期内却流行过。例如许多研究报道过,在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前期的台湾省人口中,招赘式婚姻比较常见(Wolf and Huang,

1980;Pasternak,1985;Wolf,1989;Chuang and Wolf,1995);1931年嘉兴县调查(Feng,1936)和1943年对苏州附近两个村子的调查(Tadashi,1951),均发现招赘式婚姻的比例相当高;Wolf等人根据很多研究,认为招赘式婚姻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如江西南部 and 福建、广东北部,长江三角洲如江苏等地比较流行(Wolf and Huang,1980;Wolf,1989)。以上这些研究均报道的是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中招赘式婚姻的情况,近年来对当代中国农村招赘式婚姻的研究也在增多。例如刘书鹤(1997)报道在山东平阴县的两个村子中,招赘式婚姻非常流行;严梅福等人(1995,1996)发现在湖北省的5个县历来盛行招赘式婚姻;我们发现在陕西省略阳县招赘式婚姻的比例非常高,占30%以上;韩呈吉(1992)则发现,在甘肃省陇南地区,招赘式婚姻大范围流行,到1990年底为止采取招赘婚姻形式的有14.6万户,占总户数的28%;另外招赘式婚姻在一些少数民族(如云南省的白族)中也比较流行(Hiroko,1994)。

招赘式婚姻在上述地区比较流行,说明招赘式婚姻在这些地区已经不仅是农村父系家族制度的一种应时性变化,而且也是农村父系家族制度的一种制度性变化(Wolf,1989)。在Wolf(1989)看来,中国农村家族制度的应时性变化和制度性变化之间的区别在于:应时性变化是人们作出的被动选择,而制度性变化是人们作出的主动选择。制度性变化下的招赘式婚姻不仅具有保存性的功能,同时更具有一些实用性的功能(Pasternak,1985)。这些实用性功能主要是基于一些经济因素的考虑,包括婚姻成本,如彩礼和嫁妆、劳动力需求、老年保障、致富能力等。制度性变化下招赘式婚姻主要发生在男性劳动力缺乏的家庭中,这里招上门女婿是作为增加家庭男劳力的一种手段;或者发生在比较贫穷的家庭中,因为招赘婚姻的费用对各方来说都较低(Pasternak,1985);或者发生在急需致富能力强的劳动力家庭中,因为外来上门女婿的致富能力往往要好于本地男性(Li N,et al.,1998;Li S. et al.,1998)。另外,实用性功能还与人口因素有关,例如Chuang和Wolf(1995)认为婚姻市场中的性别比的变化可能是导致招赘式婚姻的因素。

这样,中国农村的招赘式婚姻就有应时性变化和制度性变化两种类型。应时性变化类型发生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它主要是由于无男孩等家庭结构因素引起的,具有保存性的功能,这类招赘婚姻的比例很低;制度性变化类型发生在很少一些农村地区,它是由家庭与人口结构和一些经济因素引起的,具有保存性和实用性的双重功能,招赘婚姻的比例较高。由于招赘婚姻在制度性变化类型地区具有保存和实用的双重功能,因此招赘婚姻的制度性变化类型往往包含了应时性因素,是在应时性变化类型基础上的发展。然而到目前为止,对中国农村招赘式婚姻决定因素的定量分析还非常少见。产生这种情况既有数据资料缺乏的原因,也有对招赘婚姻在中国农村的作用认识不足的原因。实际上,80年代后中国农村的生育率已经很低,农村中无男孩户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由于家庭养老在未来农村社会中仍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农村的婚姻形式需要较大的变化,招赘婚姻的比例应有较大的上升。但由于目前招赘婚姻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受到歧视,因此对于这种变化,农民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整和适应。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农村招赘式婚姻的决定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性。

## 2. 数据和方法

### 2.1 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于1997年在陕西省略阳县和三原县进行的男孩偏好文化传播抽样调查(Li S,et al.,1998a)。略阳县地处陕西省南部的秦岭山脉,人口约20万,矿藏、森林和耕地等资源丰富,是陕西省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农业县,其文化属于陕南文化。略阳县农民散居在大山之中,村子的规模一般较小。由于大部分居民的祖先是来自其他

地方的移民,大家族在略阳农村中很少。尽管父系家族制度仍然存在,但不太强大。自20世纪初以来嫁娶和招赘婚姻形式均被广泛接受和实行。三原县地处陕西省关中平原,人口约40万,土地资源较少,是陕西省相对发达的农业县,其文化具有中国黄河流域文化的典型特征。由于地处关中平原,人口稠密,村子的规模相对较大,一般均有大家族存在,对村民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有较大的影响。历史上三原县一直维持着严格的父系家族制度和婚姻风俗,嫁娶式婚姻占绝对主导地位,而招赘式婚姻非常少见。由此,略阳县和三原县在历史、人文地理、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家族制度和婚姻习惯、文化风俗等方面均不相同,可以认为招赘式婚姻在略阳县属于制度性变化类型,而在三原县属于应时性变化类型(Li S, et al., 1998a, 1998b)。它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对比,可用来进行对中国农村招赘式婚姻决定因素的比较研究。

此次男孩偏好文化传播调查属于回顾性调查,它是用结构化的户问卷和社区问卷完成的。社区问卷的对象是所有被选中的村子;户问卷的调查对象是所选中村子中所有至少有一对存活夫妻的家庭户。调查样本是用整群抽样方法选取的,包括略阳县1364户中的1581对夫妻,和三原县的1567户中的1866对夫妻。根据初步分析,数据质量是比较满意和可靠的。由于一些夫妻的信息不完整,本研究的深入分析仅使用略阳县的1451对和三原县的1790对具有完整资料的夫妻的数据。

## 2.2 方法

由于本文研究结婚时是否采取招赘婚姻形式的决定因素,我们选择Logistic回归模型作为本文的基本分析模型,具体的模型包括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两个部分。单变量模型分析每个变量对婚姻形式的粗影响,而多变量模型分析每个变量对婚姻形式的净影响。模型所考虑的决定因素包括家庭因素和个人因素两大类。家庭因素有以下反映夫妻双方父母家庭背景的变量:父母婚姻类型、兄弟姐妹构成、是否属于村子里的大家族。个人因素包括以下反映夫妻个人背景的变量:结婚年份、结婚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被领养、婚姻安排、夫妻对招赘婚姻的态度。

我们在模型分析中选择这些变量,主要是依据这些变量在理论上的解释意义,同时也考虑了调查提供数据的可能性。实际上,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其他一些变量对农民是否接受招赘式婚姻可能也有影响,我们的模型分析没有包括这些变量。这样的变量有两类:一类是由于调查中没有涉及或信息不完全的变量,例如姐弟间的年龄差、兄弟姐妹和朋友的婚姻类型等;另一类是数据变化很小的变量,例如民族,招赘式婚姻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可能更为普遍,但在我们的样本中,几乎99%以上的夫妻是汉族。因此本文只能使用目前所考虑的这些变量。

## 3. 结果与讨论

### 3.1 描述性结果

表1提供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略阳县和三原县按婚姻队列划分的婚姻数和招赘式婚姻比例。从招赘婚姻的时期特征分析,略阳县的招赘婚姻比例在30~50年代婚姻队列中占23%左右;在60年代婚姻队列中达到高峰,为42%;然后降至70~80年代婚姻队列的34%左右和90年代婚姻队列的25%;相反,三原县招赘婚姻的比例虽低,但却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总体上,招赘婚姻的比例在略阳县是31.8%,远远高于三原县的4.2%。

表2提供了略阳县和三原县招赘婚姻Logistic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同前面所介绍的两个县的背景一致,两个县夫妻的个人和家庭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夫妻家庭因素中,略阳县丈夫和妻子的父母采取招赘婚姻形式的比例在17%~20%之间,远远高于三原县所对应的1%~3%。在丈夫和妻子的兄弟姐妹构成方面,略阳和三原县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略阳县无兄弟姐妹的夫妻比例在8%~9%,远远高于三原县的2%。同时,略阳县夫妻属于村

表 1 三原县和略阳县按婚姻队列的招赘婚姻比例

婚姻队列 (年代)	三原县		略阳县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30~40	54	0.0	65	21.5
50	136	3.6	130	23.8
60	248	3.6	236	41.5
70	309	4.5	267	35.2
80	671	4.5	493	33.7
90	441	4.8	378	25.4
合计	1 859	4.2	1 569	31.8

数据来源:1997 年三原县和略阳县男孩偏好文化传播调查(包括全体样本)。

我安排婚姻的比例要高于三原县,而且略阳县夫妻对招赘婚姻的接受程度也要高于三原县。总之对招赘婚姻的接受程度、夫妻的个人和家庭背景在略阳县和三原县差别很大。

### 3.2 Logistic 模型单变量分析结果

表 3 和表 4 分别提供了对略阳县和三原县招赘式婚姻决定因素的单变量(粗影响)和多变量(净影响)分析的结果。我们首先讨论单变量分析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在单变量分析中,父母婚姻类型、兄弟姐妹构成、结婚年龄、受教育年限、领养等变量虽然涉及夫妻双方的情况,但在分析中是视为一个变量进入单变量分析模型的。

在夫妻的家庭因素中,父母的婚姻类型对于采取招赘式婚姻的机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略阳县。结果表明略阳县妻子父母的婚姻类型,而不是丈夫父母的婚姻类型,对夫妻的婚姻类型有显著的正影响。这暗示着在农村招赘式婚姻的制度性变化类型存在从父母到女儿的垂直传播,而在应时性变化类型中则不存在这种垂直传播。

夫妻的兄弟姐妹构成对夫妻采取招赘式婚姻的机率在略阳县和三原县均有很显著的影响。基本上,丈夫采取招赘式婚姻的机率随其兄弟姐妹数的减少而下降,妻子采取招赘式婚姻

子里某一大家庭的比例为 5%,远远低于三原县的 51%,反映了大家族在三原县农村中远比略阳县农村中普遍。在夫妻个人因素中,略阳县丈夫的结婚年龄比三原县丈夫的结婚年龄晚,而略阳县妻子的结婚年龄比三原县妻子的结婚年龄早。在教育水平方面,略阳县丈夫和妻子的受教育年限都要低于三原县丈夫和妻子的受教育年限。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略阳县丈夫和妻子中是养子女的比例在 6%~10%之间,远远高于三原县的 2%~3%。这事实上同前面所指出的略阳县无兄弟姐妹的夫妻比例高是有内在关系的。在婚姻安排方面,略阳县夫妻中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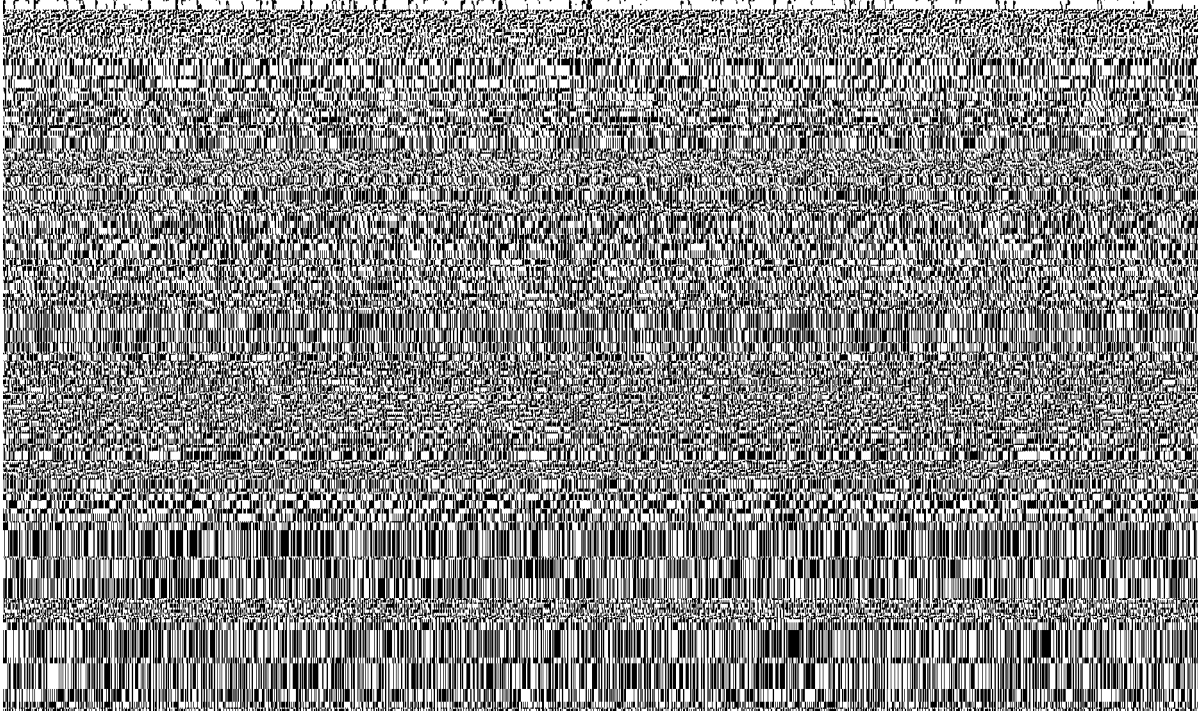


表 2 略阳县和三原县招赘婚姻 Logistic 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变量	略阳县(N=1 451)		三原县(N=1 790)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家庭因素				
父母婚姻类型				
丈夫父母的婚姻类型				
招赘婚姻	0.17	0.37	0.03	0.17
妻子父母的婚姻类型				
招赘婚姻	0.20	0.40	0.01	0.12
兄弟姐妹构成				
丈夫的兄弟姐妹				
仅有兄弟	0.17	0.38	0.10	0.29
仅有姐妹	0.12	0.33	0.12	0.32
没有	0.08	0.27	0.02	0.13
妻子的兄弟姐妹				
仅有兄弟	0.15	0.36	0.12	0.33
仅有姐妹	0.15	0.35	0.07	0.25
没有	0.09	0.29	0.02	0.13
是否村子里的大家族				
是	0.05	0.21	0.51	0.50
个人因素				
结婚年份				
1978 年以后	0.61	0.49	0.63	0.48
结婚年龄				
丈夫				
20~24	0.52	0.50	0.70	0.46
25+	0.36	0.48	0.18	0.38
妻子				
18~22	0.60	0.49	0.67	0.47
23+	0.19	0.39	0.19	0.39
教育				
丈夫受教育年限				
1~6	0.50	0.50	0.52	0.50
7~9	0.20	0.40	0.35	0.48
10+	0.06	0.24	0.09	0.29
妻子受教育年限				
1~6	0.43	0.50	0.37	0.48
7~9	0.15	0.36	0.43	0.49
10+	0.02	0.15	0.06	0.24
领养				
丈夫是否被领养				
是	0.06	0.24	0.02	0.15
妻子是否被领养				
是	0.10	0.31	0.03	0.16
婚姻安排				
自我安排	0.19	0.39	0.05	0.21
对招赘婚姻的态度				
没有儿子时可以接受	0.36	0.48	0.43	0.50
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0.06	0.23	0.07	0.25

注:表中所有的变量都是虚拟变量。这样,表中每个因素的所有类型的均值之和应等于1。每个因素中被省略的类型如下:父母婚姻类型,非招赘婚姻;兄弟姐妹构成,兄弟和姐妹都有;是否是村子里的大家族,不是;结婚年份,1978年前;结婚年龄,丈夫为19<sup>-</sup>岁,妻子为17<sup>-</sup>岁;受教育年限,0;是否被领养,不是;婚姻安排,介绍的;对招赘婚姻的态度,无论如何都能接受。

表 3 略阳县夫妻的家庭和个人因素对其采取招赘婚姻相对机率比的影响

变量	粗影响	净效应	
		模型 I	模型 II
家庭因素			
父母婚姻类型			
丈夫父母的婚姻类型			
招赘婚姻	0.84	0.84	1.71 <sup>+</sup>
妻子父母的婚姻类型			
招赘婚姻	1.70***	1.64***	2.73***
兄弟姐妹构成			
丈夫的兄弟姐妹			
仅有兄弟	0.99	0.99	1.00
仅有姐妹	0.37***	0.34***	0.34***
没有	0.64 <sup>+</sup>	0.65 <sup>+</sup>	0.62 <sup>+</sup>
妻子的兄弟姐妹			
仅有兄弟	2.13***	1.92***	1.92***
仅有姐妹	3.23***	3.05***	3.10***
没有	9.03***	6.87***	6.82***
是否村子里的大家族			
是	0.32**	0.38*	0.38*
个人因素			
结婚年龄			
1978 年以后	0.80*	0.85	1.15
结婚年龄			
丈夫			
20~24	0.91	0.94	0.96
25 <sup>+</sup>	1.13	1.04	1.04
妻子			
18~22	0.60***	0.62**	0.62**
23 <sup>+</sup>	0.47***	0.51**	0.52**
教育			
丈夫受教育年限			
1~6	0.61***	0.73 <sup>+</sup>	0.76 <sup>+</sup>
7~9	0.34***	0.54**	0.55**
10 <sup>+</sup>	0.28***	0.36**	0.36**
妻子受教育年限			
1~6	1.35*	1.42*	1.40*
7~9	1.88**	2.14***	2.12***
10 <sup>+</sup>	3.50**	6.21***	6.11***
领养			
丈夫是否被领养			
是	0.54*	0.63	0.63
妻子是否被领养			
是	3.15***	1.75**	1.77**
婚姻安排			
自我安排	0.71*	0.65*	0.65*
对招赘婚姻的态度			
没有儿子时可以接受	0.80*	0.81	0.83
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0.33***	0.30***	0.31***
交叉效应			
HPMU <sup>a</sup> ×M78 <sup>+b</sup>			0.35**
WPMU <sup>a</sup> ×M78 <sup>+</sup>			0.48*
-2LL		1 534***	1 519***
样本数	1 451	1 451	1 451

注:所有的变量是虚拟变量。每个变量所省略的类型见表1。\*\*\* P<0.001, \*\* P<0.01, \* P<0.05, +P<0.1。<sup>a</sup> HPMU 和 WPMU, 丈夫或妻子的父母是招赘婚姻类型。<sup>b</sup> M78<sup>+</sup>, 1978 年后的婚姻队列。

表 4 三原县夫妻的家庭和个人因素对其采取招赘婚姻相对机率比的影响

变量	粗效应	净效应	
		模型 I	模型 II
家庭因素			
父母婚姻类型			
丈夫父母的婚姻类型			
招赘婚姻	0.47	1.15	0.02
妻子父母的婚姻类型			
招赘婚姻	1.07	0.61	0.00
兄弟姐妹构成			
丈夫的兄弟姐妹			
仅有兄弟	1.28	1.24	1.23
仅有姐妹	0.35 <sup>+</sup>	0.22 <sup>*</sup>	0.22 <sup>*</sup>
没有	0.00	0.00	0.00
妻子的兄弟姐妹			
仅有兄弟	2.79 <sup>+</sup>	3.12 <sup>+</sup>	3.10 <sup>+</sup>
仅有姐妹	69.97***	88.34***	87.83***
没有	152.89***	199.15***	197.64***
是否村子里的大家族			
是	0.57 <sup>*</sup>	0.50 <sup>*</sup>	0.50 <sup>*</sup>
个人因素			
结婚年份			
1978 年以后	1.16	1.82	1.81
结婚年龄			
丈夫			
20~24	0.91	0.45	0.44
25 <sup>+</sup>	1.21	0.48	0.47
妻子			
18~22	0.78	0.96	0.95
23 <sup>+</sup>	0.28 <sup>*</sup>	0.42	0.42
教育			
丈夫受教育年限			
1~6	1.31	0.36	0.37
7~9	0.57	0.13 <sup>*</sup>	0.13 <sup>*</sup>
10 <sup>+</sup>	1.19	0.55	0.57
妻子受教育年限			
1~6	3.05 <sup>*</sup>	4.77 <sup>*</sup>	4.59 <sup>*</sup>
7~9	3.66 <sup>*</sup>	6.80 <sup>*</sup>	6.51 <sup>*</sup>
10 <sup>+</sup>	5.09 <sup>*</sup>	11.51 <sup>*</sup>	11.05 <sup>*</sup>
领养			
丈夫是否被领养			
是	1.61	2.95	2.94
妻子是否被领养			
是	6.39***	1.00	0.99
婚姻安排			
自我安排	0.90	0.32	0.33
对招赘婚姻的态度			
没有儿子时可以接受	0.71	0.92	0.91
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0.16 <sup>+</sup>	0.19	0.19
交叉效应			
HPMU <sup>a</sup> × M78 <sup>+</sup> <sup>b</sup>			71.51
WPMU <sup>a</sup> × M78 <sup>+</sup>			355.15
-2LL		316***	316***
样本数	1 790	1 790	1 790

注:所有的变量是虚拟变量。每个变量所省略的类型见表1。\*\*\* P<0.001, \*\* P<0.01, \* P<0.05, +P<0.1。<sup>a</sup> HPMU 和 WPMU, 丈夫或妻子的父母是招赘婚姻类型。<sup>b</sup> M78<sup>+</sup>, 1978 年后的婚姻队列。

结婚年龄对此有影响。随着妻子结婚年龄的提高,她们采取招赘式婚姻的机率在下降。这也许是因为采取招赘式婚姻的妻子的家庭往往缺乏兄弟姐妹和劳动力,因此妻子早结婚是作为弥补家庭劳动力需求的一种重要手段。

受教育水平对于夫妻是否采取招赘婚姻形式有很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关系在略阳县和三原县有所不同。在略阳县,夫妻采取招赘式婚姻的机率随着丈夫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在降低,随着妻子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在上升;在三原县夫妻采取招赘式婚姻的机率随妻子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在上升,但同丈夫受教育水平的变化没有关系。这说明招赘婚姻更容易发生在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丈夫和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妻子之间,而且这种影响在以制度性变化类型为主的略阳县比以应时性变化类型为主的三原县更为明显。夫妻的受教育水平可能既反映了他们的个人地位和家庭的经济地位,同时也反映了父母对他们的经济投资。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认为招赘婚姻形式更容易发生在妻子较富裕的家庭和丈夫较贫穷的家庭中间。这可能是因为此种婚姻匹配能够更好地解决婚姻费用问题。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种现象是父母从经济投资的角度故意选择的结果,因为毕竟招赘婚姻中的丈夫要离家去当上门女婿,而妻子要留在自己家中与父母同住。

领养状况对于夫妻是否采取招赘婚姻形式有影响,特别是对妻子而言。因此在农村,领养孩子与这个孩子以后所采取的婚姻形式是有紧密联系的,即领养一个女孩更易采取招赘婚姻形式,而领养一个男孩更易采取嫁娶婚姻形式。

婚姻安排对于夫妻采取招赘式婚姻的机率在略阳县有显著的影响,而在三原县则没有影响。这暗示着在以制度性变化类型为主的略阳县,招赘婚姻主要是通过父母安排或别人介绍来实现的。

夫妻对招赘婚姻的态度对其是否采取招赘婚姻形式的影响在略阳县很显著,而在三原县非常微弱。总体上,如果夫妻在观念上倾向于接受招赘婚姻的话,那么他们在事实上也更易选择招赘婚姻形式。但由于调查是回顾性调查,夫妻对招赘婚姻的态度是其婚后的态度,因此,夫妻实际所采取的婚姻形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对招赘婚姻形式的态度。这样我们所发现的对婚姻形式的态度和行为的因果关系也可能是相反的。但无论如何,夫妻对于婚姻形式的态度对其行为应该有一定影响。

### 3.3 Logistic 模型多变量分析结果

以上我们讨论了 Logistic 模型单变量分析的结果,它反映了各种个人和家庭因素对于夫妻采取招赘婚姻形式的粗影响。但由于这些个人与家庭因素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和相关性,因此单变量分析的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弥补这些偏差的途径之一是进行多变量分析,从而分析各种个人和家庭因素对一对夫妻采取招赘式婚姻的联合影响,即净影响。对于略阳县和三原县,我们采取了两种模型来衡量这种净影响。其中模型 I 包括了单变量模型的所有变量,而模型 II 是在模型 I 的基础上,加入了父母婚姻类型和夫妻结婚年份的交叉效应。加入交叉效应的主要目的在于衡量农村经济改革所导致的农村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对招赘婚姻形式的父母—子女垂直传播的影响。

我们首先讨论模型 I 的结果。对于略阳县,我们发现,同单变量分析结果相比,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夫妻结婚年份和丈夫的领养状况对于夫妻采取招赘婚姻形式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即这种影响不再存在。而其他变量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尽管其系数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化。这说明在略阳县招赘婚姻形式的时期效应消失了,而且领养一个男孩同其未来的婚姻形式没有关系。相比之下,三原县的多变量分析结果变化很大。其中妻子的结婚年龄、妻子的领养状况和夫妻对招赘婚姻的态度对于夫妻采取招赘婚姻形式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而丈夫受教育水平



对于夫妻采取招赘婚姻形式的影响变得显著了。教育影响的显著性主要体现在受过7~9年教育的丈夫上。这样三原县影响夫妻采取招赘式婚姻的主要因素只有兄弟姐妹构成、是否是村子里的大家族和夫妻受教育水平。

模型Ⅱ在模型Ⅰ的基础上加入了父母婚姻类型和夫妻结婚年份的交叉效应项后,三原县的分析结果基本没有变化,而略阳县的结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三原县,在加入了交叉效应项后,除父母婚姻类型变量外,其他变量对夫妻采取招赘婚姻形式影响的系数和显著性基本没有变化,而且交叉效应项也不存在。这说明由于三原县招赘式婚姻是应时性变化类型,不存在父母—子女间的垂直传播,因此农村经济改革对垂直传播的影响也就不存在。相比之下,对于略阳县,虽然在加入交叉效应项后,除父母婚姻类型和夫妻结婚年份两个变量外的其他变量,对于夫妻采取招赘婚姻形式影响的系数和显著性也基本没有变化,但交叉效应项是非常显著的,而且丈夫父母的婚姻类型对其婚姻类型的影响也变得显著了。这说明在加入交叉效应项后,略阳县父母—儿子和父母—女儿的垂直传播都是存在的,而且农村经济改革对于这种垂直传播的效应也有显著的影响。1978年前存在正的父母—子女的垂直传播效应,1978年后存在正的父母—女儿的垂直传播效应和负的父母—儿子的垂直传播效应。对于略阳县招赘式婚姻的性质和原因、农村经济改革对于招赘婚姻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及回溯性调查数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等,这里不再赘述。但应该强调的是,经济改革对招赘婚姻父母—子女垂直传播影响的前提是招赘婚姻应该是制度性变化类型,就象在略阳县一样。这种情况在三原县是不存在的。

#### 4. 小结

本文所研究的三原县和略阳县都是以汉族为主的农业县。三原县自30年代以来招赘婚姻的比例非常低,不超过5%,属于应时性变化类型,具有保存性的功能。相反,略阳县自30年代以来招赘婚姻的比例一直在20%以上,最高达41%,属于制度性变化类型,具有保存性和实用性的双重功能。这两个县农村招赘婚姻形式的两种典型情况,也许在中国农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们的研究表明,由于招赘式婚姻两种类型的目的和功能不同,其决定因素也完全不同。在三原县,招赘式婚姻是应时性变化类型,具有保存性功能,因此其决定因素相对少一些,影响夫妻采取招赘式婚姻形式的主要因素只有兄弟姐妹构成、是否是村子里的大家族和夫妻受教育水平。在应时性变化类型下,招赘式婚姻主要发生在没有男孩的家庭中,而且独生子几乎不会去做上门女婿,强烈地体现出招赘式婚姻的应时特征和保存功能。同时招赘式婚姻也更可能发生在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妻子和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丈夫之间和不属于大家族的夫妻之间,反映出即使是应时性招赘式婚姻也受家庭经济状况和家族等因素的影响。

在略阳县,招赘式婚姻是含有应时性因素的制度性变化类型,具有保存性和实用性的双重功能,因此其决定因素相对多一些。在制度性变化类型下,一系列的个人和家庭因素都影响了夫妻采取招赘式婚姻的可能性。这其中有与应时性变化类型相同的决定因素,例如兄弟姐妹构成状况,只是这种应时性特征和保存性功能与单纯的应时性变化类型相比要弱得多。另外家族因素和夫妻教育水平的影响和应时性变化类型下的情况基本相同。招赘式婚姻的制度性变化类型所特有的个人和家庭决定因素主要有父母的婚姻类型、结婚年龄、领养状况、婚姻安排和夫妻对招赘式婚姻的态度等。研究表明,招赘婚姻的制度性变化类型存在父母—子女的垂直文化传播,而且1978年后的农村经济改革所导致的农民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对这种垂直文化传播的效应有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制度性变化类型下的招赘婚姻更可能发生在父母安排或别人介绍的婚姻和对招赘婚姻在态度上更易接受的夫妻中;同时采取招赘婚姻的夫妻中,

妻子结婚年龄相对要早,而且妻子更可能是被领养的。这些结果也说明了略阳县的招赘婚姻是一种制度性变化类型,具有保存和实用的双重功能。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了解中国农村未来的人口和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一方面,80年代后中国农村的生育率已经很低,农村中无男孩户的比例在不断上升。为满足家庭养老的需要,农村招赘婚姻的比例应有一定的上升(Li S. et al., 1998a)。另一方面,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在持续上升,女孩生存机会在相对恶化,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李树茁、朱楚珠,1996)。而招赘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有助于降低男孩偏好(严梅福,1995)。例如略阳县自9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一直很正常。因此,在农村需要提倡、鼓励和支持招赘婚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目前在全国进行的“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也包括了这方面的内容。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对招赘式婚姻两种类型决定因素的对比研究结果,可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在农村推广招赘婚姻形式,这也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 参 考 文 献

1. 韩呈吉:《男嫁女娶有利于计划生育》,《人口与经济》,1992年第6期。
2. 李树茁、朱楚珠:《中国出生性别比和女婴生存状况分析》,《人口与经济》,1996年第1期。
3. 刘书鹤:《婚嫁大变革》,《人口与经济》,1997年第6期。
4. 严梅福:《婚嫁型式影响妇女生育性别偏好的试验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5期。
5. 严梅福、石人炳:《中国农村婚嫁形式在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第5期。
6. Chang, Ying-Chang, and Arthur P. Wolf (1995), "Marriage in Taiwan, 1881~1905",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3): 781~795.
7. Feng, Tzu-kang (1936), *Rural Survey of Jiaxin County* (In Chinese.), Zhejiang University with Jiaxin County Government.
8. Hiroko, Yokoyama (1994), "Uxorilocal marriage among the Bai of the Dali basin, Yunnan", In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Society: Views from Japan*: 178~185.
9. Li, Nan, Marcus W. Feldman, and Shuzhuo Li (1998), "Transmission of son preference: estimates from a survey in two counties of China", Morri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76, Stanford University.
10. Li, Shuzhuo, Marcus W. Feldman, Nan Li, and Chuzhu Zhu (1998a), "A survey of transmission of son preference in two counties of China", Morri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75, Stanford University.
11. Li, Shuzhuo, Marcus W. Feldman, and Nan Li (1998b),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uxorilocal marriage in Lueyang, China", Morri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78, Stanford University.
12. Pasternak, Burton (1985), "On the causes and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uxorilocal marriage in China", In Susan B. Hanley and Arthur P. Wolf (eds.),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 309~33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13. Tadashi, Fukutake (1951),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Rural China* (In Japanese), Yuhikaku, Tokyo, Japan.
14. Lavelly, William, and Xinhua Ren (1992), "Patrilocal and early marital co-residence in rural China, 1955~1985", *The China Quarterly*: 378~391.
15. Wolf, Arthur P. (1989), "The origins and explanations of variations in the Chinese kinship System", In Chang et al., (eds.),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the Taiwan Area*: 241~260,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16. Wolf, Arthur P., and Chien-Shan Huang (1980),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本文责任编辑: 朱 犁)